

《「文化力」の時代：21世紀のアジアと日本》，青木保，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307頁。

黃智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本書《「文化力」的時代：21世紀的亞洲與日本》的作者青木保是當代日本社會最著名、也最具有開創性的人類學家。他著述甚為豐富，從1976年其成名作《タイの僧院にて》（《身處泰國僧院中》，中央公論社）出版後，迄今已出版17冊專書，編輯譯書達20餘冊。他的理路清晰，文筆平易近人，常能結合公共議題，將艱深學理轉化為一般人的常識觀念。且他的寫作議題廣泛，除了人類學專業上的宗教儀式、異文化理解、文化政策之課題外，也涉獵文學、音樂、藝術、電影、旅遊等，在當代文化多個面向上皆有極高造詣。80年代後，他在國立大阪大學創立人類學系，一方面專注學術研究，作育人才，一方面他關懷公共事務，跳脫象牙塔式的學者形象，成為極少數在日本輿論界最具影響力的《中央公論》與《文藝春秋》刊物發表評論的學者。其著書中不乏成為膾炙人口暢銷書籍者，也屢獲文藝獎賞與勳章，¹ 將人類學的概念推廣成幾乎是國民必備的文化素養。

90年代後，他更著眼於在國家體制中提昇人類學的影響力，繼擔任日本民族學會會長、東京大學先端技術研究中心等學界要職之後，又在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創設人類學課程，對日本國家高階公務員教授人類學觀念，並推行其文化政策理念。經過這些努力，2千年之後，青木保成為有史以來，首度從民間一介學者身份被延攬入閣，擔任最高文化首長——文化廳長官的人類學者（2007年4月——2009年7月），² 讓知識理念與政策之間做了最緊密的結合。

1 1985年著作『儀礼の象徴性』（岩波書店）獲山多利學藝賞，1990年著作『日本文化論の変容』（中央公論社）獲得吉野作造賞，2000年獲明仁天皇頒授紫綬褒章。

2 日本戰後歷任文化廳長官約20人中，僅有4任由民間人接掌，其餘皆由行政體系內部出任。

本書是青木保生涯第17本專書著作，也是他在文化廳長官卸任後最新的著作，因而特別受到矚目。從作者上一本以亞洲為主題的專著《アジア・ジレンマ》（《亞洲·困局》，中央公論社）以來，已經過了十年。十年當中亞洲局勢變化甚大，中國、韓國崛起，而日本社會也經歷起伏蛻變。歷練過最高文化廳長官職務之後，是否青木保能以新的觀點，突破前書所謂「困局」，是本書最令人期待之處。

全書分為三部分，分別是：(I)東亞與文化的問題，(II)近代日本的亞洲認識，(III)「現代文明」的破綻與「文化力」，總共收錄13篇近年文章。如同作者一貫風格，本書視野宏觀遠大，行筆字字珠璣，代表進入新世紀10年來，作者考察亞洲文化現象的心得總結。較之於10年前著作，本書更能直指問題癥結，提出極具開創性與實踐性的諸多倡議。

出生於1938年，當青木保開始成長學習的年代，正是日本在二戰戰敗後，社會荒廢、資源最為匱乏的時代。受到當時日本學界泰斗石田英一郎啟發，他進入東京大學人類學系就讀。1972~73年，青木保成為日本文部省第一回亞洲諸國派遣留學生。他選擇前往泰國進行長期田野研究，並且進入僧院剃度出家，從內部體驗僧侶修行生活。書中他自述：

戰後，我們所成長的時代若要學習韓國或中國、東亞的文化，除了進入古典典籍研究之外，沒有其他途徑。即便是要進行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也無法前往中國大陸或朝鮮半島。東南亞等地是最容易去的地方，日本企業最初也都會選擇前往東南亞國家。中國本土在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之前，正開展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傳統文化。……（pp. 291-292）

由此敘述可見，日本從19世紀以來對於亞洲研究雖有其基礎，然而因大戰及國際因素，青木保這一代的學者若要研究亞洲或東亞，中國或韓國無法提供田野環境，所以他選擇的學術起點即是從泰國文化以及小乘佛教儀式的研究出發。一路走來，由泰國小乘佛教儀式連結到南亞的斯里蘭卡，進而認

識到印度文明；從泰國，他連結到半島東南亞諸國多樣的基層文化。同時他也多次訪問澳洲以及土耳其，近年來頻仍走訪中國，並積極在中國學界推廣文化人類學觀念。1965年開始，每年都有在亞洲各地旅行或進行田野工作的機會；可以說，40多年來，他的足跡遍歷亞洲各地，累積許多寶貴的經驗值，加上他對人類學理論的精準掌握，他提出了一套對東亞文化的獨到詮釋。

青木保認為，東亞地區可算是全世界少有的複數文化交錯共存的地域。比起南亞、中東、南美這些區域，東亞地區如同文化的十字路，各家齊匯，其型態更難捕捉。作者從宗教的多樣性（儒、道、佛、印度、伊斯蘭、基督教、猶太教等），語言的多樣性（橫書、縱書、漢字），民族的多樣性（區內大都是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等面向來觀察，雖然各地濃淡不一，作者認為「東亞文化」基本上是由三個層位——亦即「底層文化+二大古代文明（印度/中國）+西歐/美國現代文化」混合而成，應稱之為「混成文化」。近年各地都市人口增加，都市中產階級已經開始互享共通的文化語彙與價值觀念，不過東亞地區要成為近代西歐地區國族國家的型態仍有困難。因此在國際政治上所謂「東亞共同體」的概念若要操作必須十分注意，勿扼殺了這個地區精緻的文化多樣性。

追溯起來，日本社會對於亞洲或是東亞、東洋文化的好奇與知識探究，從百年多前明治初期的知識份子已經展開。尤其是福澤諭吉、岡倉天心、柳宗悅等人對於日本的亞洲觀之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福澤提倡的「脫亞入歐」「富國強兵」論甚至於被認為與後來導致戰爭有關。青木保在本書中，除了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之外，也以兩篇長幅論文檢討近代日本的亞洲認識。他認為岡倉天心「亞洲為一體」論調，雖然鼓吹文化的力量，但是卻對同時代亞洲其他地區文化的理解太過缺如，遂淪為空洞的高調。在本書中青木保還反思並批判日本在戰時發展出來的「大和民族」優越論政策，只有精神性而無其他知識性基礎支撐，故其擴充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概念也是虛幻的。

最後，畢竟經過文化廳長官的歷練，本書除了提出對東亞文化的全貌架構並深刻反省過去對亞洲所持有的不切實際想法之外，對於未來日本要如何重新回到亞洲之安全途徑與方向，青木保也提出諸多具有前瞻性的建言。

借鏡於美國文化界在911事件之後的反省，青木保頗為認同美國哈佛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那伊（J. S. Nye）所提出的觀念，亦即國家應該重視文化、價值觀與外交政策取向的「軟實力」，而非一味地擴張軍事、經濟這類「硬實力」，才能在國際社會受到尊敬。過去日本文化界重視的是建築、美術、雕刻等文化財式的想法，但是90年代之後，能夠不受日本經濟衰退影響，仍欣欣向榮蓬勃發展，進而輸出到其他國家的，卻是日本的動漫、電影、時尚、料理、流行音樂等這類長久以來被認為是非主流的次文化。青木保看到了東亞其實共享一個很大的文化市場，不論是東南亞或是新興的韓國、中國，都市中產階級文化都逐漸成熟，更能與日本分享共通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而上述這些文化項目與其所帶來的文創產業，也成為日本重新與亞洲文化連結的方法。

這項整體的文化政策思維，晚近已經被日本政府具體採納並付諸實踐。被命名為「酷！日本」的大戰略，成為既定國策。為此日本政府在內閣裡設置大臣，召開促進協議會，與民間合作不惜斥資600億日圓設立基金，全力支持並鼓勵這類型的文創產業。雖然其成效尚未得知，然而青木保過去十年來不斷大聲疾呼，鼓吹「文化力」的必要性，終於說服政府，其功不可沒。放眼亞洲，人類學者出身後來成為國家文化政策制訂者，並不多見。³ 可以說，青木保把關懷社會，並將知識回饋社會的人類學公共性發揮到了極致。他也記取上一世紀日本魯莽冒進的文化政策之失敗，為下一世代的日本文化進路尋求一條更務實，而且很明顯地，是與亞洲各國攜手並進的一條道路。

3 臺灣曾有二位人類學者擔任過文化行政最高首長，分別是陳奇祿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一任主委（1981.11~1988.7），陳其南擔任過第七任主委（2004.5~2006.1）。